

# 新聞史論、時事評析與新聞教育： 卓南生的傳播研究與實踐

陽美燕<sup>\*</sup>

湖南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

李傑瓊<sup>\*\*</sup>

北京工商大學傳媒與設計學院副教授

劉揚<sup>\*\*\*</sup>

北京大學新聞學研究會副秘書長

## 摘要

學者卓南生以新聞史研究和國際時評知名，歷任新加坡《星洲日報》社論委員與《聯合早報》東京特派員；而從上世紀 80 年代末在日本東京大學新聞研究所任教開始，投身中、日新聞教育三十餘年，迄今仍然以北京大學新聞學研究會為平臺，與青年學子保持對話。代表性著作為 1990 年、1998 年、2002 年及 2015 年出版的《中國近代報業發展史（1815-1874）》，與 2010 年、2020 年出版的《東亞新聞事業論》等。本文從他幼年時期目睹南洋政治的經歷出發，並在日本與亞洲社會的變遷背景下，勾勒出卓南生在史論治學、時評寫作和新聞教育方面的思想觀點；而從中國報業的新聞發生史開始，經過長時期對日本社會、華文報業的親身經驗，及在時事評析與新聞教育中，發展出清晰穩固的亞洲視角，與論從史出的歷史是非觀。

**關鍵字：**日本研究、亞洲視角、問題意識、新聞發生史

---

\* E-mail: 1291627558@qq.com

\*\* E-mail: sunnydaisylee@163.com

\*\*\* E-mail: 1014182423@qq.com

卓南生出生於日據時期的新加坡，受教於東南亞反帝反殖民運動中的華文中學<sup>1</sup>和南洋大學<sup>2</sup>，留學於戰敗後的日本。後回返新加坡參與《星洲日報》和《聯合早報》筆政，歷任社論委員與東京特派員，先後在東京大學（1989-1992）、名古屋大學（1992-1993）和龍谷大學（1994-2010）任教。他以生活經驗出發，兼有國際視野與在地關懷，同時在報史研究、時評寫作、新聞教育等領域耕耘。

1989年聘為東京大學新聞研究所副教授，係該所首名外籍專職教學人員；1990年，首次於東京百利堅社出版《中國近代新聞成立史 1815-1874》日文版著作。此書中文版《中國近代報業發展史（1815-1874）》先後於1998年在臺北正中書局、2002年在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增訂版、2015年在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增訂新版。1994年，轉任龍谷大學教授，參與籌辦國際文化學部，長期負責主編《國際文化研究》，力促不同地區相異文化的當代交流。

在與兩岸中國新聞史研究者的學術交流中，積極發表意見，彰顯東南亞視野的亞洲華人觀點；2006年，於世界知識出版社出版《卓南生日本時論文集》（《日本政治》、《日本外交》、《日本社會》）。2010年，他從日本大學提前退休，以北京大學新聞學研究會<sup>3</sup>為交流平臺，在北京大學、華中科技大學、廈門大學等校服務，投身新聞教育及新聞史論研究梯隊的培育。2020年，

1 在東南亞，華文教育始終風雨飄搖，全靠熱心教育的華社（包括社會賢達和勞苦大眾）支持。面對英國殖民當局的歧視與不公待遇，自力更生的新馬華文中學生很早就將爭取母語學習、維護華文教育地位視為天職，並結合時局，積極參與運動。卓南生就讀的新加坡南洋華僑中學（簡稱華中）創立於1919年，在南洋大學成立前，為「南洋最高學府」，也是新馬華文教育的堡壘。他們對於任何旨在削弱母語教育根基的改制十分敏感，並予以抵制和反抗。1961年，新加坡自治邦政府決定實行中學改制，從三三制（初、高中各三年）改為四二制（初中四年、高中二年），便被視為意圖改變華校、讓它與英校接軌的措施，並引發學生罷考。為順利推行政策，1961年的華中有同學700餘人同時畢業（包含初中四生、高中三生，和提前畢業的高中生）。與馬來西亞的民營華文獨立中學（簡稱獨中）在經濟上自食其力、勉為其難求存的艱苦處境不同，接受官方全面改制的加坡華文中學雖無經濟上憂慮，卻逐步改變為英校。自1987年起，華文小學停辦，新加坡進入沒有傳統華文中小學的年代。卓南生此時經歷的1960年代，正是發展前期；今日新加坡的政治架構，尚未完全成形。

2 1953年，在新加坡福建會館會長陳六使捐贈與倡議下，東南亞華社開展了興建南洋大學的熱潮與運動。這所1956年開學、1980年被強行與新加坡大學合併、變相「亡校」的民辦大學在25年間先後培養了1.2萬多名南大人，在國內外教育界、文化藝術、政治、經濟、醫學、法律、工農商等領域作出貢獻。南洋大學是一所海外華人為捍衛母語文化，在英殖民政府百般阻撓下，全由民間支撐而建立的唯一海外華文大學。南大興亡史實際上也是新加坡與馬來西亞華文教育盛衰史的縮影與象徵。卓南生就讀期間，正逢南洋大學面臨諸多旨在改制、變質南大的「報告書」出籠，及南大師生相應抵抗和反對的時期，也是認識「南大精神」的最佳時刻。

3 研究會成立於1918年10月14日，由北京大學時任校長蔡元培發起並擔任會長，聘請留美研習新聞學歸國的徐寶璜、《京報》社長邵飄萍擔任研究會導師。是中國第一個系統講授並集體研究新聞學的團體，出版了中國第一本新聞學著作《新聞學》，創辦了中國第一份新聞學期刊《新聞週刊》，被公認為中國新聞學教育和研究的開端。（方漢奇先生語）2008年4月15日，北大新聞學研究會恢復成立，由時任北大校長許智宏任會長，後由程曼麗教授接任執行會長。

他在 2010 年於東京彩流社出版日文版《東亞新聞事業論——從官版漢字新聞、戰時傀儡政權的新聞統制到現代》的基礎上，於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東亞新聞事業論》，彙集新聞史研究、國際時局觀察相關論文，以更完整的方式闡述學術觀點（卓南生完整年表，參見文末附錄）。

在前述背景中，1950 年代、1960 年代的新（新加坡）馬（馬來亞聯合邦或 1963 年成立的馬來西亞），1960 年代、1970 年代的日本社會是刺激卓南生學思發展的物質環境，1980 年代、1990 年代以後的東亞地區，特別是華人所在的兩岸四地則是他學思觀點主要分享、推廣的場域。

這份論文由三位青年學者共同完成，研究方法主要是以卓南生大量原文稿件與各類評論、文獻為基礎，輔以口述歷史的釐清。論文分四個部份展開書寫，分別是成長經歷、新聞史論、日本時評與新聞教育，以期完整揭示卓南生的實踐歷程與學術思考。

## 壹、時代與個人：卓南生的成長經歷

### 一、「激動的年代」與「南洋意識」形成

卓南生入讀的南洋華僑中學，以「自強不息」為校訓，是東南亞第一所華文中學，為陳嘉庚倡辦成立於五四運動爆發前夕的 1919 年 3 月。1956-1961 年間，他在此完成基礎教育；此時東南亞的華文教育欣欣向榮，師資多為南來文化人，其中不乏國家級名家（卓南生，2021）。卓南生回憶指出，在赤道土地上認真地受教於這些老師，讓他滿滿地吸收著中華文化的正能量（卓南生，2019）。

東南亞各國有著被西方國家殖民和被日本侵略的沉痛記憶，二十世紀 50、60 年代，反帝反殖、民族獨立運動在亞洲、非洲、拉丁美洲廣泛興起。1955 年在印尼召開的亞非會議（又稱萬隆會議）（Asian-African Conference），所形成的「萬隆精神」鼓舞著各國民眾發起爭取民族自決的獨立運動及建國事業。不少曾受五四運動洗禮的中國知識份子於二戰前來到東南亞各國，加入當地的文教事業，傳遞了以反帝、愛國為主要內容的「五四精神」，正與此時東南亞各國民眾的需求契合；會議召開當年，卓南生在光洋小學（創辦於 1918 年）讀六年級。他的班主任以講故事的方式將會議情況傳達給同學們，他們由此知道了印尼的蘇加諾（Bung Sukarno，1901-

1970) 總統、印度的尼赫魯 (Jawaharlal Nehru, 1889-1964) 總理、緬甸的吳努 (U Nu, 1907-1995) 總理和中國的周恩來 (1898-1976) 總理，懵懂中接受「萬隆精神」，他小學時製作的第一本剪報就是萬隆會議的圖片集。<sup>4</sup>

卓南生指出，中、小學裡不少老師直接或間接受到「五四運動」影響；作為學生的他們，學習非常認真，歷經身份認同的掙扎（指從「華僑意識」逐步轉為「華人意識」，但主張維護華文母語教育在新興國家中應有的地位），都以自己是華校生為豪（陳禹蒙，2014）。他回顧這段經歷說到：

「五四精神」（1919）與「萬隆精神」（1955）是當時東南亞青年的兩面鮮明旗幟，國民意識與身份認同感的改變並不會影響新一代青年知識份子對這兩面旗幟的認同和堅守（賀心穎，2020，頁7）。

卓南生將二十世紀 50、60 年代，稱之為東南亞地區「激動的年代」。一邊是民眾獨立呼聲熱火朝天，一邊是殖民統治者為既得利益做著最後部署（卓南生，2020）。置身於這一時代，在五四精神放射下，新馬華族青年加入了反帝、反殖、爭取獨立運動和建設新興國家的高潮中，激發出濃厚的「南洋意識」。從落葉歸根的「華僑意識」轉為在東南亞各所在國落地生根的「華人意識」，是時代投射在新馬華族青年身上的集體印痕。

為解決華校生當地升學和師資問題，時任新加坡福建會館會長的陳六使（1897-1972）登高一呼，各地華人有錢出錢、有力出力，掀起一股支持創辦海外華文大學——南洋大學的熱潮。1956 年，南洋大學正式開學。1962 年卓南生考入該校，並選擇政治學專業，在這所多災多難的校園中接受「南大精神」薰陶。

此時正是新加坡、馬來亞爭取獨立運動的關鍵時刻。不論是英國殖民者還是日本侵略者，都把華文視作實施殖民統治的障礙。在風雨飄搖中，卓南生接受了相對完整的養成教育。新加坡同代人對這段歷史可能有著不同看法，但他們都從親身經歷中深刻認識到，文化教育對於政治統治、社會思潮、價值觀念之重要，也體會到還原歷史真相與發掘歷史真實的艱難。這段經歷讓他重視基於研究者主體性的「問題意識」，強調分析問題既要看到強勢者所說的一面，更要努力探究「知者不言、言者不知」的另一面，在歷史大背

---

4 卓南生回憶道：「我們從小學六年級到初中的時候，到處可以看到各個政黨群眾大會慷慨激昂的場面，最後大家都會齊聲高喊『孟迪卡』（即馬來語「獨立」）」（卓南生，2013，頁4-5）。

景下進行觀察、思考、辨析。讓這種文化自覺和責任感紮根在知識份子心中是教育的重要目的。基礎教育時期所獲得的中華文化資源、受到的文化薰陶，以及反殖運動催生的東南亞華人身份認同意識，為卓南生在研究中堅持亞洲視角和歷史是非論史觀埋下伏筆。

## 二、日本「國論二分」中的「文化震撼」

1966 年，卓南生負笈東瀛。為了在亞洲研究亞洲，到日本研究日本，探明戰後的日本與戰前有著怎樣的變和不變，他開始「在日本摸索新聞學」的歷程；這與他的成長背景不無關係。1942 年 4 月卓南生出生時，新加坡已是日本殖民地，被改名為「昭南島」。時代和時勢孕育了這一代人的問題意識。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我們同年代的人一出生就和日本結下了不解之緣。我們必須瞭解，為什麼日本兵來到新加坡？新加坡為何被辱稱為「昭南島」？「昭南島」時期又為何被視為「新加坡史上最黑暗的日子」（卓南生，2013，頁 9）？

帶著這一關懷，他於 1966 年轉入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學部新聞學科——二十世紀 50-60 年代日本最好的新聞學科之一，成為二年級插班生。彼時日本教育體制尚未受到英美實用主義影響，鼓勵學生尋找問題並形成研究選題。比他略早赴日的新加坡留日大學畢業生協會創會會長范介璋曾說：

日本教育不是由需求情況來決定，而是自由教育，你要讀什麼就讀什麼，向興趣的那方面發展（卓南生，2006c，頁 495）。

在這樣的環境中，卓南生可以較自由地選擇老師與課程。某些課程是在「喫茶店」中進行的；某些課程密切聯繫時事，討論、發表成為教學的重要方式；某些課程還會鼓勵學生客串講授。

二十世紀 60 年代，日本戰敗的景象殘留在街頭。斷手斷腳的舊「皇軍」在鬧市奏著軍歌乞討；神保町的舊書店裏，30-40 年代為配合「大東亞聖戰」出版的刊物和書籍堆積如山。在美國監管下推行民主化改革二十多年後，許多戰前的理論和思維方式依然普遍。不論是在大學校園裏和同學對話，還是與普通日本市民交談，卓南生感受到日本人對亞洲（特別是東南亞）缺乏基本常識且不關心。



一個典型案例是：在早稻田大學講授《現代新聞論》的酒井寅吉（1909-1969），曾是《朝日新聞》從軍記者，極力讚美「大東亞『聖』戰」，也是日本新聞傳播學界知名的《綜合新聞事業研究》季刊創刊主編；新加坡淪陷時期，他親身目睹並報導了日軍將領山下奉文（1885-1946）<sup>5</sup>勸降英國司令官白思華將軍（Arthur Ernest Percival，1887-1966）<sup>6</sup>的轟動新聞。酒井在課堂上大講「客觀報導」和追求「真相」理論，卻對自己曾經美化戰爭的報導未有絲毫檢視，他甚至撰文肯定和緬懷相關報導。日本教師這種停留於戰前的基本態度與思維，實為巨大的文化震撼（卓南生，2020）。

另個參照案例是：抵日後，卓南生最初想研究新加坡和馬來半島的報業史，特別是日占時期報史。1969年早稻田大學新聞系關閉之際，他恰好成為最後一屆畢業生。他先到京都同志社大學短暫學習、後轉到當時處於日本新聞學研究主導地位的東京大學新聞研究所，準備攻讀碩士。他曾考慮師從時任新聞研究所資深教授（曾任該所所長）、戰爭期間曾被日本同盟通信社派往馬來半島作隨軍記者的殿木圭一（1909-1994）。遺憾的是，當他向這位會說幾句中文普通話和粵語、待留學生十分親切的教授談起要研究日本佔領新馬時期的新聞史題目時，對方卻皺起眉頭，一周後告知有關資料已「完全佚失」，建議換個題目（卓南生，2008）。在殿木那裏，卓南生也未聽到任何有關日軍統治馬來半島新聞真相的話題。

上述日本老師，還有在立教大學執教、戰前德國法西斯主義新聞論旗手和戰後美國大眾傳播功能主義論的鼓吹者小山榮三（1899-1983），都對卓南生新聞史研究產生了不可忽視的反向作用：既促使他轉向從東南亞起步的近代中文報史方向，也進一步強化了他審視殖民主義和侵略戰爭「是非論」的學術史觀。卓南生用「踽踽獨行」來形容在日本從事新聞史研究的狀況；這種境況，也給了他獨立摸索新聞史治學道路的定力和意志。

從社會面來看，當時讓他和許多東南亞留日學生感到驚憾的是，在談論太平洋戰爭時，有那麼多日本人都深信日本當局為發動戰爭而炮製的「ABCD包圍圈論」，即日本是在美國（America）、英國（Britain）、中國

---

5 日本帝國陸軍將領。太平洋戰爭期間負責指揮日本第25軍進攻英屬馬來亞，花2個多月的時間佔領整個馬來半島，攻陷英國在東南亞的政治經濟中心新加坡，被稱為「馬來之虎」。佔領新加坡期間，曾以“肅清”為名對當地華人進行大屠殺。1944年任第14方面軍司令，被派往菲律賓作戰，直到日本投降。1945年12月7日以大屠殺罪被馬尼拉軍事法庭判處絞刑，1946年2月23日執行。

6 英國陸軍將領，1941年5月至1942年2月擔任馬來亞陸軍總司令，1942年2月15日因戰敗率8萬軍隊向日本投降，標誌著包括新加坡在內的整個馬來亞半島全境淪日軍統治。

(China) 與荷蘭 (Dutch) 包圍下被迫開戰的。換句話說，太平洋戰爭被認為是一場日本「自我保衛」的戰爭，而非對亞洲的侵略。保守陣營甚至提出「日本在這場戰爭中，難道一無是處」的議題，力證所謂「日本侵略東南亞（部分）有功論」。上述觀點共用了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本學者提出「近代的超克」的認識論，強調（一）日本打垮白種人的歐美帝國，給亞洲人帶來信心；（二）從結果看，東南亞各國紛紛擺脫歐美殖民統治，獲得獨立，不能不歸功於日本（卓南生，2006a，2020）。

二十世紀 60-70 年代，日本處於「國論二分」時代，新舊思潮針對日本何去何從展開激烈爭論。在以大眾傳媒為主要管道的文化空間裏，有反對《日美安保條約》的聲音，有支持的吶喊；有主張日本對歷史進一步反思的觀點，也有堅持戰前「皇國史觀」的論調。這對於想瞭解日本「變」與「不變」的卓南生來說，既帶來了思想衝擊，也提供了諸多有助於建立富含歷史意識的認知參照系統。卓南生反覆提及，他的日本觀一定程度上形成於留日時期。<sup>7</sup> 在新聞傳播學界，當時有不少學者主張在反思日本侵略戰爭的基礎上探索戰後出路；對於戰爭期間日本軍國主義如何利用媒體進行法西斯輿論宣傳，東京大學新聞研究所的內川芳美（1926-2004）、荒瀨豐、香內三郎（1931-2006）和高木教典（1931-2015）等都進行了深入研究。

在上述背景下，卓南生認真探索新聞業與文化侵略和文化反抗之間的關係。他同時從內川芳美和香內三郎那裏學到了精準處理史料的嚴謹態度。課堂之外，日本社會的「國論二分」成為他的「第二課堂」。

在那個時期，日本政治、經濟、軍事、文化、教育等許多有爭議性的問題都被提出來，並成為全民辯論的大課題……我在早稻田大學念書的那幾年，真正上課沒有幾天，因為同學們經常罷課（卓南生，2013，頁 7）。

曾任《朝日雜誌》(*Asahi Journal*) 主編的立教大學教授影山三郎（1911-1992）是少有的對戰爭問題不迴避，肯正面具體回答提問的老師。1970 年 11 月 25 日，右翼作家三島由紀夫（1925-1970）在闖入自衛隊總部進行演說後切腹自殺。這一震撼日本社會並在亞洲引起廣泛關注的事件，不僅說明日本國內正掀起一股狹隘沙文主義的情緒，同時釋放出日本軍國主義意識死灰

7 這正如卓南生所言：「往後我在寫有關新聞或評論時，腦中並不是一張白紙，而是多少知道它的來龍去脈。」（卓南生，2013，頁 8）。

復燃的政治信號。「三島由紀夫事件」發生當天，<sup>8</sup> 影山曾以沉重心情分析了法西斯時代日本類似事件的發展過程，和戰後日本軍國主義勢力思潮的概況，這情境至今仍印刻在卓南生的記憶中。

影山提醒到，1946年《和平憲法》剛剛制定，1947年日本就出現了想要扭轉形勢的「空氣」。1940年代末期以後，各種懷古情調在日本社會陸續浮現。知情者都明瞭，這其中包含著特定歷史時空和語境下孕育出來的特殊感情。類似蛛絲馬跡說明，日本社會戰前、戰後在精神方面是藕斷絲連、一脈相承（吳學文、卓南生，2005）。

影山對日本戰時與戰後輿論連續性的關注，對戰後日本「逆時針轉」現象的批判，為卓南生提供了觀察日本社會的重要線索。留日期間，他注意到大眾傳媒大談「日本傳統文化」、緬懷「日本國粹」、強調「日本民族色彩的東西」及「大和精神之必須提倡與發揚」，已成為「文化日」不可缺少的重要節目。

戰前日本的某些紀念日與天皇中心思想、軍國主義精神是分不開的。戰後，這些充滿侵略意識的紀念日照理應該被完全廢除。然而，戰後日本的「和平憲法」並沒有全面剷除舊有侵略亞洲之陰魂。戰後的「祝祭日」雖不敢像戰前那樣明目張膽，公開鼓吹軍國思想，但一開始就很巧妙地埋下「復活」之伏線了（卓南生，2006a，頁21-26）。

「戰後的日本到底改變了沒有？」構成了卓南生日本時評寫作的問題原點；對日本政治、文化、社會「變」與「不變」的持續觀察與追問，構成了他日本時評寫作的動力。

眼看著那跌宕起伏的日本政治連續劇與虛虛實實的外交遊戲，及日本傳媒擅長的輿論誘導與造勢，仍難以抗拒發抒己見的誘惑力，而每每有奔赴現場，追蹤大事件及其演變，進而剖析其緣由的衝動（卓南生，2006a，2006b，2006c，頁9）。

從大學開始，他就認為，新聞學是同社會現實緊密聯繫的學問，應當兩

---

8 有關「三島由紀夫切腹事件」及其在日本社會的影響，可參見以下三篇時評文章。〈震撼日本的三島切腹事件〉（卓南生，2006a，頁240-244）；〈三島事件以後的動向〉（同上引，頁257-260）；〈揭開「三島美學」的面紗——評《三島切腹事件之思想上解釋》〉（同上引，頁261-268）。



條腿走路，堅持理論與實踐相結合。從學界到報界，再從報界到學界，他始終要求自己「做學問不忘記現場，在現場當一線新聞工作者也不忘記研究」（卓南生，2013，頁1），以鮮明的問題意識貫通教學、研究和實踐。

## 貳、深耕新聞發生史

卓南生在新聞史領域的耕耘，可以「精深細作」來形容，並因此被方漢奇先生喻為「中國境外學者研究中國新聞史的新的高峰」（卓南生，2015，頁33）。從最初準備研究日據時期新、馬報業史，到在日本碰壁後轉向摸索近代中文報業發生史；從在日本踽踽獨行的華文報史淵源摸索，到逐步擴大至中國新聞史學界主流的學術交流，卓南生始終堅持東南亞華人視角，以及歷史是非論。他深耕新聞發生史，在一手史料論證下發掘大量報刊原件，取得以《中國近代報業發展史（1815-1874）》（先後在東京、臺北和北京出版）和《東亞新聞事業論》（先後在東京和北京出版）為代表的系列成果，形成領域聚焦、史觀鮮明、方法論貫通、視野國際化、主體性突出的治學路徑。

### 一、摸索新聞發生史的師承與影響

卓南生基本拜遍當時日本新聞學界的名師。前述給他帶來「文化震撼」的三位老師，無一不是日本新聞學界響噹噹的人物。從這些老師的反應中，他感到在日本做日據時期的新馬新聞史研究行不通。所以，他轉向以新馬地區報刊為出發點的近代中文報史研究。《察世俗每月統記傳》1815年在馬來半島馬六甲創刊，《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則是1833年在廣州創辦，1837年轉到新加坡續辦。

二十世紀60-70年代，是日本反戰思想最濃厚、知識界開明思潮高漲時期。他回憶道：在反戰浪潮中，東京各高校基本處於半停學狀態。這給了他自由探求的機會，其中包括去選擇契合自己學術思想意識的名師。1969年4月他從東京的早稻田大學轉至京都，準備去新聞學大師（城戶又一、鶴見俊輔）薈萃的同志社大學師從開明派學者——日本新聞史學史權威和田洋一（1903-1993）攻讀碩士。從狹義新聞學而言，當時日本只有東京大學社會學研究院和同志社大學文學研究院開辦新聞學碩士課程。同志社大學因學潮長期停課，兩個月後他返回東京，在時任東大新聞研究所所長池內一（1920-

1976) 安排下跟隨殿木圭一學習了十個月。1970年，卓南生決定投考立教大學研究院，攻讀應用社會學（主修新聞學）碩士學位，師從「瓦版」新聞史權威平井隆太郎（1921-2015）（「瓦版」即日本江戶時期的新聞類似物）。他從流傳於日本早期華文報部分原件和幕府末期的「官版翻刻漢字新聞」的線索出發，完成了碩士和博士論文。

平井是日本新聞學開山鼻祖小野秀雄教授戰後的嫡系大弟子，在他推薦下，卓南生得以兩次拜訪年逾八十、正在撰寫回憶錄《新聞研究五十年》的小野先生。在書房裏，小野取出用布巾精心包裹的資料、私藏的《遐邇貫珍》原件及其密密麻麻的讀報筆記，向卓南生講述自己兩度前往大英博物館內圖書館查閱《察世俗每月統記傳》等的經過，啟發他查找早期華文報刊資料的線索（卓南生，2015）。他也從小野秀雄於戰前、1922年出版的《日本新聞發達史》及其學術回憶錄中，獲得原件史料追蹤的靈感。

在這種師承的啟蒙與啟發中，卓南生對「新聞發生史」產生並保持著濃厚興趣（卓南生，2020）。1973年秋，修畢博士課程、應邀到新加坡《星洲日報》工作兩年多後，他向報館請假、停薪留職並跨越東西兩大洋，遍訪大英圖書館、倫敦大學亞非學院圖書館等尋找原件資料。1972年，提交碩士論文《關於19世紀華字新聞紙產生之緣由與特徵的考察（1815-1856）——以《察世俗每月統記傳》和《遐邇貫珍》為中心》；1986年，提交博士論文《近代型中文報紙的形成過程與確立——從1815年《察世俗每月統記傳》創刊至1874年《循環日報》的誕生》。以此為基礎，他持續鑽研，陸續於1990年及2020年完成《中國近代新聞成立史（1815-1874）》與《東亞新聞事業論》。這些成果都是「新聞發生史」研究的「補充與延伸」，後來在1998年、2002年和2015年不斷增訂的《中國近代報業發展史（1815-1874）》，也是日本兩代宗師治學精神的傳承。

經平井允許和推薦，卓南生在東大同時修讀香內三郎和荒瀨豐的課，並獲得立教大學碩、博士課程認可的學分。香內、荒瀨兩位老師及內川芳美、高木教典等東大新聞研究所的學者，對日本戰前法西斯新聞學的反思和批判，<sup>9</sup> 都給他的新聞史研究帶來深刻影響。而他與東大新聞研究所的學術緣

9 如【日】荒瀨豐於1957年發表的〈日本軍國主義とマス・メディア〉（〈日本軍國主義與大眾傳媒〉）、【日】內川芳美、荒瀨豐、香內三郎等人於1959年發表的〈日本ファシズム言論統制に関する研究1〉（關於〈日本法西斯言論統制的研究①〉）。對此，卓南生指出：「在戰後的民主化運動與反戰運動邁向高潮的二十世紀50、60年代乃至70年代，日本的新聞學者和報人也曾有過一段反思的時期。在東京大學新聞研究所諸多名師及優秀的新聞工作者的帶動下，日本戰時的法西斯新聞體制及其淵源與影響曾被解剖和批判，就是佳例。」（卓南生，2020，頁9）。

分，在 1989 年高木教典任所長時，迎來了最受矚目的時刻：特聘卓南生為專職「文部教官助教授」，即教育部國立大學教官副教授，打破東大社會學研究院不聘請外國學者的慣例，成為當時新聞熱點。

## 二、研究成果引起新聞史學界「轟動」

關於「新聞發生史」研究的由來，在〈中國近代報業史研究的線索與誤區——兼論日本「官版翻刻漢字新聞」與戈公振的困惑〉一文中，卓南生清楚指出主要涉及日本官版翻刻漢字報紙，以及中文同一報紙原件之異同及由此產生的相關問題（卓南生，2020）。「官版翻刻漢字新聞」是指幕府末年、明治維新前，在西學東漸背景下，日本當局急需獲取海外資訊，遂將西人在香港（已淪為英國殖民地）和中國對外通商口岸上海、寧波等地所辦的漢字報紙，經過當時日本知識份子（即「蕃書調所」、後易名為「洋書調所」的御用官僚）的審閱，加以若干刪減，重新翻刻成自己所需、改頭換面的小冊子（新聞紙）（同上引），小野秀雄稱之為日本近代報業的「老祖宗」之一。

在翻刻版出現前，日本民間流傳著一些私人手抄本。傳入最早、流傳最廣的是香港《遐邇貫珍》的手抄本。之後，經官家陸續特許翻刻的有《官板中外新報》、《官板六合叢談刪定本》、《官版香港新聞》，以及《官板中外雜誌》等。平井隆太郎便指出，即使在江戶時代（即日本文化向中國一邊倒的時代），日本對中國資訊傳媒的瞭解也十分有限（卓南生，2015）。可想而知，幕末和明治初年，日本傾心於歐洲「蘭學」和西方近代化模式；官版翻刻漢字新聞，無論是作為中國人日本知識的重要來源，還是作為近代日本與中文報業的特殊關聯物都獨具意義。

雖意義獨特，但研究者寥寥。只有小野秀雄從日本新聞史的角度作了拓荒式的資料查證和推論。他在《日本新聞發達史》中梳理日本近代新聞史的源流時，簡潔介紹了中國漢字新聞紙對日本報紙的影響，後來又花了不少精力梳理和推論諸如日本版《香港新聞》等與《香港船頭貨價紙》係同份報紙，前者只是後者的日本手抄翻刻版或翻譯本。除這些研究外，對官版翻刻漢字新聞原件的追蹤與深入分析，基本是空白。研究中國「邸報」與小報史的足立利雄在評價卓南生貢獻時指出：

日本的中國研究，從古至今在各個領域都開展得深入且詳盡，

唯獨關於中國社會的資訊傳播狀況——例如從「古代報紙（新聞）」到「新聞類似物」，再到現代的報紙、廣播等等——相關的歷史研究幾近空白，即便有，也只是停留於片斷的研究（足立利雄，1991，頁 121）。

正是從這「片斷研究」中得到啟發，卓南生敏銳覺察到，這些被改得面目全非的日本官版翻刻漢字新聞（小冊子），會是解開中國近代報紙源流謎底的一個入口。他將這些日本官版翻刻版稱為近代中文報刊的「準原件」。<sup>10</sup>他將此作為一種有力論據，最大限度覓得原件並進行比較和分析，探求「近代型中文報紙的形成過程與確立」。這種曲徑通幽的「新聞發生史」研究影響深遠，平井對此指出：

首次填補了日本在這研究領域之空白並發出光芒。實際上，在國際學術界裏，對本書所涉及的中國報業史有關時期的研究或論著，甚至比日本還更為貧乏。從這個角度來看，……具有極其重大意義，毫不過分（卓南生，2002，頁 43）。

遵循著日本新聞史學者小野秀雄和中國報史專家戈公振的步伐，卓南生踏上了尋根究底、發掘早期中文報刊原件和準原件的學術歷程。他尋遍日本各大圖書館、舊書店、私人收藏家，到處打聽早期流入日本的中文報紙。他利用回返新加坡途經港、臺的機會，遍訪兩地圖書館和書坊，拜訪多位報史研究者。後來，他又從新加坡報館停薪留職前往英倫，並輾轉英、德、法、美、港、臺等地，開始一番在世界各地「大翻書報」的作業，發現了一系列尚未被挖掘和利用的一手史料，其中就包括十分關鍵的早期中文報刊原件。

他將日本版（包括手抄本、翻譯版和翻刻版）與中文原件從報頭、出版時間、版面安排到內容刪減等一一比對和推斷。基於這些大量原件和「準原件」的發掘與縝密考證，卓南生得出有關早期中文報紙的一系列可靠發現，訂正了長期以來以訛傳訛的史實錯誤，現略舉一二如下：

在劍橋大學圖書館發現《香港中外新報》1872年5月4日原件，這是迄今為止所能看到的最早原件（卓南生，2002）；在美國艾塞克斯文物院（Essex Institute），後易名為皮博迪·艾塞克斯博物館（Peabody Essex Museum）發

10 卓南生說：「筆者長期努力尋覓各種早期中文報刊的原件或準原件，從而探索與探求各報刊之創刊緣由與特徵，最終都回歸至如下的原點（即問題意識）：近代中文報刊是『怎樣而來的』」（卓南生，2015，頁 2）。

現《香港中外新報》的前身——《香港船頭貨價紙》79份1859年的原件。卓南生將這些珍貴原件與幕末流行於日本的手抄本《香港船頭貨價新聞紙》、「洋書調所」翻刻的《官版香港新聞》、日文譯版《香港新聞紙》這三個版本的「準原件」相比對，同時與該報母報《孖刺報》（*The Daily Press*）、1872年5月4日《香港中外新報》原件相參照，推斷其關係與相關史實，最終推翻了戈公振關於該報創刊於1864年之說，以及最初報名為《中外新報》的「定論」。

他指出《香港新聞》並非香港另行出版的一份報紙之名，而係中文報紙《香港船頭貨價紙》的日本版這一確切史實（即當時從未有《香港新聞》這一中文報刊的出版），又發現日本近代新聞史和中國近代新聞史的起源交叉，創立了新說。

在大英圖書館和歐美日圖書館及私人收藏家發掘到如下原件：美國在華首家華文報刊——寧波《中外新報》的瑪高溫（Daniel Jarome Mac Gowan，1814-1893）主持時期29期原件，應思理（Elias B. Inslee，1822-1871）接續主持時期4期原件，日本所翻刻應思理主持時期《官板中外新報》11期原件，《鈴木大雜集十六》收錄該報的7期手抄本及其他多個日本手抄版。

通過比較，得出如下觀點和發現：（一）日本手抄本比翻刻版更能忠實於原報；（二）在報紙原件不足情況下，日本手抄版和翻刻版是窺見該報全貌的重要線索；（三）指出戈公振《中國報學史》1927年和1928年版影本插圖將原件與日本官版翻刻漢字新聞混為一談造成的混亂及原因，並糾正了個別研究者依據不充分的資料或孤證便試圖輕易推翻戈公振關於該報創刊於1854年正確日期的論斷。

發現《德臣報》（*The China Mail*）中文專頁《中外新聞七日報》（《香港華字日報》前身）——自1871年3月11日至1872年4月6日的原件，從中證實「西學巨擘」陳靄廷在1871年才就職於《德臣報》；發掘在「七日報」停刊前的最後數期，曾刊載有關「唐字新聞紙」即將面世的啟事，以一手史料推翻了「《香港華字日報》創刊於1864年」的權威舊說，釐清了該報的基本面貌（卓南生，2002）；在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他發掘出《香港華字日報》初創期間長達兩年零三個多月的大量原件（1872年5月6日【第9號】至1874年8月25日【第442號】），並將該報改版為日報的準確日期訂正為1874年2月21日，結束了只能依靠「碩果僅存」的一份舊報影本進行碎片化研究的窘境，使該報成為同年代香港華文報中原件保存最為完整的



一份報紙。

這樣的史實訂正還有多處，不一而足。對這些原始資料的發掘及其意義，中國新聞史學前輩方漢奇描述為「引起轟動的新聞史論新著」。

上個世紀 80 年代中期以後，卓南生教授的一些論文，開始被譯成中文，在中國內地的專業雜誌上刊出，立即引起了中國新聞史研究工作者的重視。……引起了中國新聞史研究工作者的震驚。……（方漢奇，2002 年 12 月 12 日）。

方漢奇進一步指出這些成果「引起轟動」的重要原因：

之所以出現上述的情況（按：指戈著中的失誤和錯誤），是因為前面提到的那些報紙和刊物，除了少數幾家在中國國內有少量存留外，大部分都已失藏……這也正是卓南生教授的那些論文引起轟動的一個重要原因（方漢奇，2002 年 12 月 12 日）。

復旦大學新聞史學家寧樹藩仔細閱讀這部 1998 年中正書局出版的繁體字版「新加坡人對中國報業史研究的新突破」後，對這「發掘原件正本清源」之作評價道：

在這裏，不容有無根之談和主觀臆測，一切裁斷必依事實。凡屬存疑記述，不論來自權威，出自眾口，或為當事者所寫……都必須將其置於事實前面一一加以檢驗。孤證不立，證據力求充分……就是這樣一步一個腳印地，攻克一個又一個疑難障地，澄清了中國早期新聞史研究的上述種種混亂狀況，撥開迷霧，顯露真容。中國的中文報紙、中文日報究竟是「怎樣而來的」？現在得到了滿意的回答。卓教授的研究成果，對中國新聞史學科建設，作出了重要貢獻，功不可沒（卓南生，2015，頁 274）。

日本早稻田大學的土屋禮子將卓南生的《中國近代新聞成立史（1815-1874）》，及之後的寧波《中外新報》等研究，置於東亞新聞史學術史發展的坐標上來評價。她認為卓氏的研究成果與北根豐編的 64 卷《日本初期新聞全集》出版已經：

突破了 1920 年代構築起來的初期新聞史研究的水準。換言之，

這些研究成果已經擺脫了小野秀雄的《日本新聞發達史》（大阪每日報社、東京日日報社，1922）、戈公振的《中國報學史》（上海商務印書館，1927）以及明治文化研究會的研究框架，開拓邁向東亞新聞史的研究之道（土屋禮子，2011，頁 295）。

卓南生的學術成就帶給學界的貢獻，並不只是堅持訂正報史研究種種錯誤和補充疏漏的「史料派」考據功夫，更重要的是通過「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的學問精神和科學探求，<sup>11</sup> 點滴成篇，對中國近代報業發生史作出基於「有多少證據，便說多少話」的體系性、整體性闡述。在書評〈一字一汗滴，十年心血盡成書〉中，臺灣政治大學新聞學者彭家發寫到：

各篇章皆按主要報刊創刊年份，依序排列，蔚成一頗為完整體系和結構。故本書系以緒論作為導讀，簡略地點出中國「邸報」（京報）這類「古代報紙」源流，作為「滑入」近代「新報」之「時光隧道」。這樣的一種跨時空大動作……這一鉅觀式的整合，便賦予華文報業的世界觀，從而由一個建制性架構，得窺華文報業階段性發展，可謂用心良苦（彭家發，1999，頁 290）。

在嚴密考證中，體現報刊創辦歷史背景、辦報由來、資金來源、主編主筆、人脈關係的「中觀」考察，進一步結合報刊自身的成長變化，將報刊個案結成報刊群，從中揭櫫近代中文報業從萌芽到誕生、從源流到譜系、從成長到演變等「新聞發生史」的「鉅觀式」結構，「微考據」與「大動作」嚴絲縫合，正本清源，充滿著歷史發展的邏輯感與歷史正義的價值觀。

### 三、「亞洲新聞史學家怎樣才會獲得國際學界的尊重？」

亞洲新聞史學家怎樣才會獲得國際學界的尊重？這是卓南生新聞史研究亞洲視角之問題意識，也是其新聞史書寫的最高立意。

卓南生強調，各國的新聞生產及其發展過程不盡相同，中國的新聞史研究者大可不必將歐美新聞史研究的典範當作「金科玉律」。他認為，不論是歐美、日本或中國，努力發掘本國早期原有資訊媒體（新聞類似物），深入探討其形態、特徵與發展，作為考察近代報紙起源的原點，辨析其連續性與

11 香港學者黃仲鳴稱為「卓南生精神」（黃仲鳴，2010年3月13日）。

非連續性，應值得尊敬。他表示，方漢奇 1978 年撰寫的〈從不列顛圖書館藏唐歸義軍「進奏院狀」看中國古代的報紙〉一文，深入解讀了世界上最古老報紙——進奏院狀，意義非凡。<sup>12</sup>

他以此為例指出，以「邸報」為代表的中國「古代報紙」（或曰「新聞信」），在世界新聞史上是佔有一定地位的。歐美新聞史學家將其「新聞信」，視為「近代報業」的雛形，小野秀雄及其弟子們則發現，江戶時代將新聞或風聞印成單張或小冊子、報販沿街邊讀邊叫賣的「讀賣瓦版」，其實就是日本獨特的「新聞類似物」，頗有德國「飛紙」<sup>13</sup> 性質，從而記載入日本新聞史冊。

這說明日本新聞史學家並不樣樣以西說為衡量本國新聞發展史的唯一依據和標準。恰恰相反，怎樣努力發掘本國確切有力的史料，如何從中辨析本國新聞發生史的特徵及其與歐美的差異，是新聞史研究者被賦予的重大課題和使命。也惟其如此，亞洲（其他非歐美源流的國家亦然）的新聞史學家才會獲得歐美學界的尊重（卓南生，2020，頁 177）。

這段充滿史家正氣之語，道出了新聞史學家的研究主體性從何而來、如何而來，也是卓南生在各個場合都強調的「新聞史為誰研究、為何研究」的根本問題。這就能夠理解為何多年來他把中國「古代報紙」置入中國近代「新聞發生史」的研究視野。他在《中國近代報業發展史（1815-1874）》「增訂新版自序」（卓南生，2015，頁 1-79）和〈中國近代新聞史研究的虛像與實像〉（卓南生，2020，頁 357-406）中，反覆提出如下論題：

- （一）焦點：近代報紙跟「古代報紙」有沒有關聯性？
- （二）從概念到概念的誤區：「近代報紙」才是報紙？
- （三）近代化中文報紙的萌芽期特徵：「報紙」與「雜誌」尚未嚴格區分
- （四）宗教月刊（編者）如何看待中國「古代報紙」？
- （五）早期商業報紙如何安置邸報？

上述論題的研究結論是：西方在向中國引進「新報」這種「近代型」報紙的概念時，從一開始就注意到流傳於中國上層社會的傳統資訊媒介——

12 在該文中，方漢奇（2018，頁 125）指出：「它有點近似於西方中世紀的新聞信，然後卻比西方最早的新聞信還要早上好幾百年。所不同的是，新聞信主要是為早期的西方資產階級傳達經濟情報服務的，而早期的邸報，則主要是為封建地方政權瞭解朝廷消息，鞏固和維護他們的統治地位服務的」。

13 德國沿街販賣的新聞類似物 Flugblatt，德文原義是 Flying page。

《京報》，故洋人稱自己所辦的報紙為「新報」，並一度讓《京報》成為「新報」新聞版最主要的組成部分，這說明他們心中有著中國「古代報紙」的影子。為吸引閱讀《京報》的讀者群，宣傳西方的「道」與「理」，在辦報宗旨與典範上，從宗教月刊時開始，就表明其首要宗旨是「必載道」而非「傳新知」；他們在華辦「新報」從不忘記配合母國國策，推行「國益」優先與「雙重標準」的典範（卓南生，2015，2020）。

卓南生不僅發現西人在華中文報刊的首要宗旨為「載道」，還指出他們自始至終推行「國益論」與「雙重標準」，後者是歐美新聞業至今仍在奉行的「金科玉律」。他進一步拋出了這些結論依存的「研究範疇」及研究方法論：錨定中國「古代報紙」與「近代報紙」、宗教月刊與「新報」這兩對「矛盾物」的存在，強調既要看到它們之間的差異，又不輕易否定其連續性。

日本琉球大學西里喜行為《中國近代新聞成立史（1815-1874）》（1990年日文版）撰寫書評時，談到原生於歐美文明的「近代化」文化機制及其意識形態的資訊媒介，指出：

19世紀以降中國與歐美接觸的過程，是歐美試圖依照自身模式改造傳統中國的過程，也是傳統中國以歐美強加給自己的「近代化」為槓桿，促進自身變革；並逆其道而行之，以反侵略、反殖民地化的手段進行改造和轉化的過程。報紙、雜誌作為歐美「近代化」的象徵，獲得傳統中國的接納。19世紀後半期以降，由中國人自己主辦的、以中國讀者為對象的華文報紙開始發行。這也是中國自我變革、民族主義形成過程中扮演重要角色的一個範例（卓南生，2020，頁180）（原刊於日本《中國研究月報》，【東京：中國研究所】1991年5月號【第519號】，頁35-36）。

上述觀點與卓南生的研究結論不謀而合。換句話說，正是西人帶來的舶來品——「新報」所奉行的「國益」至上和「雙重標準」的辦報典範，促使早期接觸和參與「新報」或「準新報」活動的中國報業先驅王韜（1828-1897）等決定自籌款項自辦新報。從這角度看，萌芽期中國近代報業史正是一部中國人要求擺脫外國勢力對傳媒控制、爭取言論自由，從而表達國家民族意識的鬥爭史（卓南生，2015）。卓南生高度概括了這一歷史過程：

從米憐於1815年在馬六甲創辦《察世俗每月統記傳》，介紹西

方「定期刊物」的報刊概念與形式到中國，直到王韜掌握報紙這一傳播媒介，倡辦「華人資本，華人操權」的《循環日報》，藉以維護華人的利益及喚醒其國人與當局力圖革新，以應西力東漸之變化，充分反映了這60年間中西關係變化的巨大。這60年間的變化，其實也正是中文報刊從誕生、萌芽、成長而演變為「近代報紙」的過程。《循環日報》在版面編排與內容方面的成熟，正標誌著近代中文報業邁入新的里程碑（卓南生，2015，頁210）。

這一甲子的滄桑巨變，成就了中國人於1874年自辦成功的第一份中文日報《循環日報》，後者成為中國近代報史上一篇華章，對這一「前奏」到「華章」的演變過程所作濃墨重彩的著筆，彰顯出卓南生作為亞洲華人新聞史學家的研究主體性。

在歐美強加的「近代化」或曰「現代化」槓桿面前，中國及亞洲其他國家的新聞史論研究者，應該以鮮明的主體意識，建立自己的國家民族主體性，唯有如此，才有跟歐美學界展開平等對話的可能。縱觀卓南生以考證為基、以審視為軸的《中國近代報業發展史（1815-1874）》，及作為它補充與延伸的《東亞新聞事業論》，無不彰顯著鮮明的亞洲視角、對西學引進予以審慎的吸收與辨析，堅持理性批判的態度和歷史是非論的價值觀。

## 參、日本時評寫作

「在亞洲研究亞洲問題」的信念，不僅體現於卓南生的新聞史研究，也貫徹在他近60年的日本時評寫作中。1967年，他開始為新加坡《星洲日報》和《南洋商報》撰寫通訊稿。他認為：

在有關日本的資訊還不那麼多的時代裏，這些一手的體驗記或來自日本的通訊稿，不失為當時人們瞭解日本的一個管道（卓南生，2008，頁2）。

二十世紀60年代中期，因特定的歷史原因，新加坡的青年人大多前往英國留學。「到日本，到底能學些什麼？」面對親朋師友的不解甚至反對，卓南生抱定「在亞洲研究亞洲問題」的殷切願望踏上了留日攻讀新聞學的道路，他坦陳：



正如不少同年代的朋友一般，作為一個想挑戰困難的年輕人，我想「走一條少人走的道路」，想用自己的雙眼、用自己親身的體會，將戰後新生日本的真實情況告訴親友。作為新聞系學生，為了學以致用，我在1967年就開始寫東京通訊（卓南生，2013，頁9）。

1973年，卓南生返回新加坡出任《星洲日報》社論委員兼研究部主任。1983年3月，新加坡《星洲日報》與《南洋商報》合併為《南洋·星洲聯合早報》（簡稱《聯合早報》）。1987年10月，他出任《聯合早報》首任駐日特派員。1989年4月，他被聘為東京大學新聞學研究所副教授，轉入學界後仍筆耕不輟。

自1967年至今，由他執筆的日本時評，陸續見刊於新加坡《星洲日報》、《南洋商報》、《聯合早報》等華文報紙，也有不少文章曾同時或分別見刊於馬來西亞的《星洲日報》、香港的《信報》、《明報》、《大公報》、臺灣的《聯合報》、《中國時報》、《中時晚報》、《日本文摘》、中國大陸的人民網日本版、《世界知識》、《中國青年報》與《參考消息》等。在透析日本政治、外交和社會思潮的走向上，這些時評文章不僅及時提供詳實資訊和深刻見解，同時也為研究日本和亞洲問題積累了有力文獻。

## 一、日本社會的「變」與「不變」

卓南生日本時評的中心主線從未離開對日本「變」與「不變」的思考，尤其是對日本的社會思潮及其亞洲報導在戰前、戰後的連續性與非連續性的檢視，具體的問題是：戰後的日本是不是真的有別於戰前？日本是怎樣看待亞洲的？日本的大眾傳媒怎樣報導亞洲？促使日本國策變與不變的因素究竟為何？

對明治維新以來日本近代化道路和「皇國史觀」的檢討、對日本亞洲觀的視野盲點及其外交政策的批判、對日本大眾傳媒報導特徵和輿論誘導機制的剖析，構成了他日本時評思想脈絡的三個重要支點。

如何辯證地評價明治維新的歷史影響，與如何看待另一個問題緊密相關，即「日本的近代化模式」是否值得提倡？中國和亞洲的其他發展中國家是否應借鑒日本明治維新當年「近代化」模式的道路？在1968年「明治維新百年祭」時，日本國內對這一問題掀起了熱烈討論。

日本知識界對近代日本的發展道路有兩種截然不同的評價：持正面評價者往往支持日本的近代化模式，忽略其侵略行徑給亞洲和日本人民帶來的災難。不少日本開明知識份子在正面評價明治維新的同時，也強調近代日本史本質上是對外膨脹和擴張侵略的歷程，主張應充分反思明治維新促使日本走向軍國主義道路的慘痛教訓（毛章清等人，2021；吳學文、卓南生，2005；卓南生，2020）。

卓南生指出，日本政府為何要大張旗鼓舉辦「明治維新百年祭」，日本知識界為何針對明治維新的歷史評價呈現不同看法等，都需要立足「國論二分」的時代背景才能把握問題根本。所謂「國論二分」，就是輿論界圍繞日本的國家走向分為兩個陣營，保守陣營主張堅持日美安保體制，主張修改「和平憲法」第九條；革新陣營反對《日美安保條約》，反對修改「和平憲法」，主張獨立自主，維護和平路線。簡單來說，「國論二分」可以視為「親安保」與「反安保」、「修憲派」與「護憲派」圍繞日本國家發展道路選擇的論爭。

戰後日本為防止重走軍國主義老路，在憲法前文強調和平主義，並於第九條作出明確規定：（一）日本國民誠實地希求以正義和秩序為基調的國際和平，永遠放棄通過發動國際戰爭、武力威脅或行使武力等手段解決國際紛爭。（二）為了達到前項目的，（日本）不能擁有陸海空軍以及其他軍事力量。同時，也不承認國家有交戰權（卓南生，2006a）。是否堅持維護「和平憲法」第九條，與是否能夠正確評價明治維新百年來「日本的近代化模式與歷史道路」的這個問題息息相關，更關係到戰後日本是否在充分反思歷史教訓的基礎上做出未來的道路選擇。

為分化國內反戰力量，治療國民「恐戰」、「厭戰」情緒，日本政府採取了一系列策略：篡改教科書內容，為日本發動侵略戰爭編造「出兵有理」或「迫不得已」的理論和故事；操縱大眾傳媒，渲染復古情調，提倡戰前精神；營造「輿情」、「空氣」，先後策劃舉辦「東京奧運會」（1964年）、「明治維新百年祭」（1968年）和「大阪萬國博覽會」（1970年）等三場活動（卓南生，2020；毛章清等人，2021）。親歷過這些活動也見證了日本當局、保守派知識份子和大眾傳媒虛虛實實的輿論誘導，卓南生指出：

日本官方希望推廣的歷史敘事，旨在強調明治維新的光明面，炫耀近代日本的成就與「國威」，重塑「大和民族的榮光與信心」。1970年的特殊性體現在，日美軍事同盟條約在這一年即將期滿。

在反對續簽《日美安保條約》的呼聲中，保守陣營同時希望借助上述大型「演出」，通過誘導輿論，轉移公眾的注意力。從結果上看，日本當局的這波操作取得了效果（卓南生，2006a，頁 5-7、8-10）。

日本是否會重蹈覆轍？日本將往何處去？類似的憂慮和警示經常出現在卓南生的日本時評中。他憑著鮮明的問題意識、敏銳的觀察能力和肯於鑽研的治學態度，捕捉到日本社會思潮的諸多症候，進而可以做到「見一葉落而知歲之將暮」。他深刻意識到，即便在戰後革新陣營最能發揮制衡作用的時期，明治維新以來日本效仿西方列強，奉行「脫亞入歐」、「富國強兵」、「弱肉強食」路線，對外發動侵略戰爭的歷史及其近代化模式，並沒有得到徹底反思。戰前遺毒仍頑強存續在戰後日本的知識結構乃至精神構造中。

在「國論二分」時代，日本社會內部尚有一股開明、進步的力量與保守、倒退的力量進行抗爭，發揮著重要的制衡作用。遺憾的是，這股制衡力量日漸微弱。二十世紀 90 年代以後，日本社會愈發難以聽到不同的聲音。1994 年以後，日本政壇進入「總執政黨化」和「總保守化」時代，保守陣營與革新陣營的勢力對比發生結構性變化（卓南生，2006b）。卓南生經常提醒人們注意：

由於缺少制衡力量，戰前的史觀與諸多理論，在日本官方的鼓吹和保守陣營的回應下，經過重新包裝和再生產，不僅被日本國民廣泛認可和接納，還對亞洲鄰國的歷史認知產生了影響。這些「新瓶裝舊酒」的論調，或通過「部分有功論」為日本對亞洲的侵略行徑正名，或通過為「近代的超克」翻案進而美化「大東亞戰爭」，或通過形形色色的「亞細亞主義」誘人墮入「大國夢」的思維陷阱（毛章清等人，2021，頁 193-197）。

## 二、祛除「亞細亞主義」迷思與傳達亞洲心聲

通過從 1960 年代到 1990 年代中期的持續觀察，卓南生明確指出，戰前的「亞細亞主義」其實就是「日本主義」，其中心思想是「日本是亞洲的當然盟主」。戰後，由於戰前的「盟主論」未被清算，在一個事事講究次序排列和力量對比（即弱肉強食有理），且自居亞洲第一的日本社會裏，任何形式的亞細亞主義實際上都難逃「日本乃亞洲當然盟主」的結論與命運（卓南

生，2006a)。

明治維新以來，「脫亞論」和「興亞論」則是影響日本國策的兩股重要思潮。「脫亞論」的中心思想是恥與亞洲人為伍，要「脫亞入歐」。「興亞論」雖標榜「解放亞洲」，其實質是由日本作為「盟主」取代西方白色人種奴役亞洲人民。這兩者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但均以日本對亞洲的控制作為邏輯起點。日本在對外侵略擴張的膨脹期，雖將「脫亞論」作為主導思想，但出於戰略需要，特別是發現憑一己之力難以同西方諸國對抗，或在亞洲其他國家和地區遭受抵抗時，就會舉起「興亞論」的迷惑性招牌，提倡「亞細亞主義」。日本大眾傳媒上的亞洲報導與亞洲論，以及日本的亞洲政策走向，遂成為他撰寫時評、從事教研工作不可或缺的課題。他多次直言：

也許正是因為這樣的政治土壤與氣候，戰前、戰時日本「從軍記者」「報導員」的「戰記」及當時新聞理論家們的輿論宣傳活動和理論，在戰後也原封不動，而未受到應有的反思和「檢證」（驗證）。因此從亞洲人的角度來看戰後日本知識界的言論，便有時難免有格格不入之感（卓南生，2008，頁7-9）。

1940年至1945年，日本媒體上曾出現過一段短暫的「南方報導」熱。卓南生指出，在那個報紙跟隨著戰爭成長的時代裏，日本「南方報導」的興起與結束，始終與其侵略亞洲的國家政策緊密掛鉤。

日本的「南方報導」隨著日本南進步伐的加速與軍事力量的膨脹匆匆而來，也隨著日本軍力的衰微而有如退潮般匆匆而去。從事「南方報導」的大批新聞記者和文化人，在對東南亞缺乏基本認識的背景下，在所謂日本「國運」與「國益」的指引下，扮演著「文化尖兵」的角色（卓南生，2008，頁25、33）。

戰後的日本大眾傳媒應該從「南方報導」中汲取怎樣的教訓（卓南生，2006a）？帶著這個問題，審視觀察二十世紀60年代以來日本東南亞報導的論調與特徵，卓南生遺憾地發現，「南方報導」的遺產（包括當時為服務日本「國策」而散佈的東南亞觀）在有意無意中得到繼承，日本戰前的「南方報導」與戰後「東南亞報導」在立場、理念與角度等方面都具有內在連續性。這體現在，未擺脫以日本「國益」與「日本企業利益」的立場和思考，在日本經濟勢力以美國為保護傘重返東南亞的背景下，扮演著「刺探東南亞人民

的對日感情」的「文化尖兵」角色。未擺脫戰前「北人南物論」（卓南生，2006a）的認知視角，只重視市場、資源等經濟議題，對東南亞爭取民族獨立和國家獨立的主體性實踐及其合理訴求視若無睹。未擺脫戰前「盟主論」的影響，以日本為中心的（東南亞各國對日本的）「期待與不安論」在進入二十一世紀後，逐漸簡化為東南亞各「弱小國家」對亞洲「大國日本」的「期待論」。<sup>14</sup>

卓南生注意到，日本的大眾傳媒緊跟政府步調展開輿論誘導，以日本的「國家利益」、「企業利益」或日本人為中心進行報導，這些原則在戰前、戰後始終如一。他因而將日本大眾傳媒的報導特徵總結為三點，即「劃一性」、「集中豪雨型」和「激情主義」（毛章清等人，2021；卓南生，2020）。他喜歡引用日本前首相宮澤喜一關於日本大眾傳媒的作用：

令人惋惜的是，戰後日本的國民仍然容易盲從政府。在戰後，國定的教科書已經不存在，但取而代之的，卻是影響力巨大的大眾傳媒。國民仍然是金太郎糖（東洋經濟週刊，1991；轉引自卓南生，2008，頁 22）。

「金太郎糖」是一種棒狀的糖果，無論用刀切哪一段，其截面的圖案都是相同的金太郎的臉孔，比喻沒有個性的群體（卓南生，2008，頁 22）。這個例子說明，在日本媒體統一口徑、不斷、反覆地以煽情方式集中報導的影響下，日本社會對某些問題（特別是外國的問題）能夠很快形成統一看法。日本特有的記者俱樂部制度，促使記者與採訪對象的關係密切，加上「政、官、商、媒」的鐵四角關係，進一步強化了日本媒體報導和言論的同質性。

面對日本大眾傳媒同質化、大規模、富有煽情性的輿論誘導，卓南生強調，要提高警惕，審慎辨析，避免落入日方議題設置的圈套。對於日本社會思潮和輿論氣候的變化，必須長期追蹤和觀察，從日本當局刻意放出的一些試探風球中嗅出其真意與動向，才能從亂象與虛像中把握真相。事實上，戰前的歷史道路和思想遺產在戰後日本未得到徹底清算，隨著政治「總保守化」和制衡力量的喪失，日本的大眾傳媒經常歪曲歷史事件，鼓吹狹隘的民族主義和狹隘的愛國主義，為軍國主義招魂。

14 參見〈日本戰前「南方報導」與戰後「東南亞報導」的連續性與非連續性〉（卓南生，2008，頁 46-47）。同時可參考〈亞洲眼中的日本 日本眼中的亞洲——什麼是真正的國際性？〉（同上引，頁 224-231）。



實際上，動輒使用「反日」「排日」「侮日」這類詞語，是戰前日本傳媒的一大特點，目的無非是要把外國人對日本國策贊否的是非問題，轉變成民族對立或「國益」的衝突（吳學文、卓南生，2005，頁 172；卓南生，2008，頁 217-223）。

不分是非對錯，只將是否符合日本「國策」、「國益」作為判斷標準，以「親日」或「反日」這種貼標籤的方式轉移問題焦點的思考和輿論誘導方式，在戰後的日本理應銷聲匿跡。但遺憾的是，事實並非如此。從這個角度看，戰後日本的新聞工作者與戰前日本的從軍記者是相似的。卓南生不斷地探尋著相關的問題：戰後的日本究竟與戰前有何不同？日本究竟在哪一方面變？哪一方面不變？

在讀到 1992 年出版的《日本政治評論二十年》時，《人民日報》記者蔣亞平高度評價卓南生的日本時評能夠「以批判眼光把握日本政治發展」，能夠「對日本政府戰後政策的種種蹊蹺之處，提出尖銳、坦率的批評」，能夠傳達「亞洲的心聲」（蔣亞平，1993）。2006 年，《卓南生日本時論文集》（三卷本）在北京出版。這部文集收錄了卓南生自 1967 年以來對日本時政、外交與社會動向的觀察與思索，總字數多達 180 萬。馬來西亞星洲媒體集團總編輯蕭依釗在賀電中誠摯指出：

字裡行間，讀得到卓教授屬於赤道青年特有的執著與熱情；讀得到卓南生先生曾為新聞記者的敏感；讀得到卓南生先生身為學者的視野。他的這份「固執」，卻得以為亞洲歷史留下寶貴的資訊（卓南生，2013，頁 353）。

### 三、堅持「亞洲視角」和「歷史是非論」

受到「萬隆精神」和東南亞民族解放運動影響，「亞洲意識」和「亞洲視角」構成了卓南生歷史觀與問題意識的內核。他以日本時評寫作為基點，持續解構旨在合理化帝國主義侵略歷史的各種理論和觀念，不斷揭露深受文明等級論影響的各種世界觀，以對日本保守陣營在話語實踐領域中建構出來的神話祛魅。基於對「世界範圍內的帝國主義文化和歷史上對帝國主義的反抗」（Said, 1993 / 李琨譯，2003）的關注，他的日本時評（包括以時評文章的材料和觀點為基礎發展而來的對談文章、研究論文）得以和諸多站在知識

去殖民化立場的研究形成對話。他駁斥日本形形色色的「亞細亞主義」和所謂「太平洋戰爭（部分）有功論」。

經歷過日本殖民統治的苦難時代（各國教科書稱之為「史上最黑暗的日子」），東南亞各民族深刻地體會到只有團結一致，把形形色色的殖民統治者趕出去，彼此的生命、自由和財產才會有所保障。換句話說，殘暴的日本「皇軍」統治時期，是刺激東南亞民族主義情緒高度成長，促使每一個東南亞人決心當家做主，建立多元民族國家的重要因素（卓南生，2008，頁 38）。

他批評一廂情願以日本為中心的（東南亞各國對日本的）「期待與不安論」，完全忽視了「期待與不安」是雙方共同存在的問題（卓南生，2008）。他批評日本的「東南亞通」基於戰前「華僑利用論」的思維框架，將已經擁有當地國籍、對所在國具有強烈認同感和歸屬感的華人定位為中國「援軍」，企圖挑撥東南亞華人與當地各民族間的不和，為以後煽動當地「排華」、「反華」情緒進行輿論鋪墊（吳學文、卓南生，2005；卓南生，2008）。

他不認同西方媒體（包括日本媒體）將亞洲的民族主義視為「洪水猛獸」的論調。從亞洲人民的歷史實踐看，民族主義的興起和民族解放運動的開展，趕走了新老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者，因此，帝國主義者和殖民主義者實際上是最害怕民族主義。他審慎提醒，民族主義走過頭就變成了狹隘的國家主義，或者是排外主義，都是不行的。他認為應該區分正當、正常的民族主義和排外的民粹主義（卓南生，2013）。

他將歷史研究的諸多習慣移植到時評寫作中。「為誰報導？為何報導？」，是他從事報業史研究時考察、評價各類報刊的標準，也是他撰寫日本時評遵循的實踐原則。對基本事實（史實）的掌握要力求準確，避免脫離時空脈絡對材料進行主觀、片面的解讀。這個新聞史論研究的方法也貫徹在他的時評寫作中。他強調不論是做學術研究，還是從事新聞報導與時評寫作，都要在明確的問題意識的指引下，充分佔有資料，辨析資料的準確性，以正確的歷史觀將碎片化的資料串聯起來，才能全面展現歷史事件（新聞事件）的面貌，卓南生認為，歷史觀是有關「正義」與「非正義」、「黑」與「白」、「是」與「非」的重要問題。在長達半個多世紀裡，他的日本時評堅持「歷史是非論」，傳達「亞洲的心聲」。

對於我們研究亞洲近現代史的人來說，在殺人者和被殺者之間，在侵略者和被侵略者之間，肯定是有能正面和不能正面評價的「人」與「事」（卓南生，2013，頁5-6）。

## 肆、新聞史論教育

卓南生在看待為何而學、如何來學、學些什麼等有關問題時，常保持著批判態度。這與他所處的歷史環境及個人求學、從教經歷相關，且可以概括為兩個階段和兩種身份——二十世紀40年代至80年代初，作為一位受教者，在新加坡及日本長期求學和在英國相對短暫的留學經歷；80年代末至今，他主要是從教者，在日本和中國多所高校教學，從而有了更多的比較觀察。他將這些得來的思考帶入教育的具體實踐，推動新聞史論的研究與教學。

### 一、在日本新聞學國際化浪潮中步上講臺

1986年9月卓南生在日本立教大學獲取該校首個社會學（主修新聞學）博士學位，1989年他作為第一位外籍專職教員從《聯合早報》東京特派員轉到東京大學新聞學研究所任副教授，都成為日本新聞學界國際化發展的標誌性事件。在日本新聞學國際化的背後是該學科對其存在地位與未來出路的困惑。

在東京大學弱肉強食的學科博弈中，作為校內的一個小單位——新聞研究所必須求新求變才能生存和發展（陳娜，2014，頁59）。

在全球各地，新聞學的設立多是因為新聞業務的發展引發社會關注，新聞行業也力圖提高業務水準與社會威望。作為一個後起且與實踐密切相關的領域，其學術地位一直受到挑戰，「新聞無學」、「新聞無用」的質疑不侷限於一國一地。這給新聞學帶來兩重影響：新聞學與社會輿論及意識形態相關部門關係緊密，更容易受到各種權力和利益因素的影響；新聞學不斷從其他學科借鑒和引入理論與方法，力圖證明自身學術存在的獨特價值。

在多個場合，被問及新聞學研究和教育的核心問題是什麼時，卓南生表示「新聞自由是一個無法繞開的課題」。他所說的新聞自由並不囿於西方主

流概念中的新聞自由，而更重視在縱觀新聞業與近代化歷史關係的基礎上，通過檢討誰出資、誰操權、為何、為誰等基本問題形成的對新聞自由的追尋。在新聞學三支柱——新聞理論、新聞倫理與新聞史中，卓南生堅定表示，新聞史起著重要的基礎作用。新聞學科的獨特優勢在於新聞史的發掘與思考。

東京大學新聞研究所源自 1929 年成立的東京帝國大學新聞研究室，以培養研究人員為重點，超脫具體的新聞實務，期待能進行新聞理論與新聞史的研究。隨著戰後美國「大眾傳播學」(mass communication) 典範的引入，日本的新聞學逐漸大眾傳播學化。二十世紀 80 年代，東京大學新聞研究所在其日文名稱保持不變的情況下，英文名稱悄然轉換為「新聞與傳播研究所」(卓南生，2020)。二十世紀 90 年代，大眾傳播似乎也不能完全概括行業在全球的發展情況，「情報」(information) 成為學術流行語。為了緊跟國際潮流，也為了獲取更多社會資源，1992 年，東京大學新聞研究所正式更名為東京大學社會情報研究所。在東京大學新聞研究所擁抱時代潮流、改變名稱十年後，日本文部省認為研究所成果欠佳，「無太大作為」，最終被併入東京大學情報學環(陳娜，2014)。對於這一結果，卓南生引用日本新聞傳播學者新井直之的一段話加以解釋：

要不斷地思考為什麼與為誰而搞「傳播」與「情報」的課題，如果離開了「為什麼」與「為誰(服務)」的觀點來談「傳播」與「情報」，無疑成為「時代的奴隸」(卓南生，2020，頁 209)。

東京大學新聞研究所的易名與閉所令人遺憾，鑒於研究所摸索出路和易名的過程恰好發生於卓南生在職期間，他後來常以該所的盛衰史作為新聞學研究「誘惑」與「陷阱」的案例，警示新聞學研究不要迷失學科的自我定位。他因而引導和鼓勵學生在廣泛涉獵的基礎上，要在新聞史專題上不斷深入，舉一反三、以一敵百，形成對普遍規律的把握。他曾笑言，自己有關近代中國報業發展史的研究也關注了「新媒體」，只不過是屬於王韜等人那個時代的「新媒體」，其中涉及的「誰來辦報、為何辦報」等關鍵問題則已超越具體時代與媒介技術的各種形態。

## 二、涉足中國大陸的新聞史論教學與研究

1994 年轉至龍谷大學後，卓南生招收留學生、邀請中國學者訪學，積極

推動與中國學界的交流。

2000年，他利用學術年假在北京大學擔任客座教授，講授「日本政治與外交」、「日本政治與日本傳媒」等課程。他的授課以教師講授與學生發表相結合的方式進行，一大特點是「不設限」，話題不設限，討論不設限，結論不設限。對於課堂上同學的發言，他很少輕易直接肯定或否定，更多情況下，他會圍繞同學的發言補充分享他所知道的事實。課堂上熱烈討論的氛圍讓卓南生對中國新聞學教育充滿期待。

我深深地感受到中國大學生求知欲的強烈和探求真理的精神，相比當時已逐漸消失「夢想」的日本大學生，顯然有著明顯的差異。北大生的學習熱忱與求知精神遠在東大生之上（陽美燕，2015，頁1-2）。

課堂之外，卓南生還安排各種與同學溝通交流的活動，傾聽他們關於學術乃至中國社會眾多話題的看法。通過交流，他越發意識到：

儘管北大生學習熱忱高、思維敏捷和開放，但從他們交來的期末報告等來看，未經思考的整合性、非原創性的論文佔絕大多數。說白了，同學們都欠缺「問題意識」，基本上都不是帶著問題去寫論文或報告，而是在等待老師分配研究題目（陽美燕，2015，頁2）。

卓南生絕不給學生分配研究題目，在他看來，如果自己連要研究什麼都不知道，根本沒有資格修讀深造。學生應弄清楚「為何研究、為誰研究」的基本問題，通過「大翻書、亂翻書」形成對學科領域的鳥瞰圖並找到自己所要研究的問題。

他利用各種機會引導學生形成「問題意識」。2002年，他圍繞「日本佔領與中國新聞事業」課題，<sup>15</sup>與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師生開展共同研究。在他親身示範下，其中部分學生（如劉揚）對新聞史研究產生興趣並找到長期關注的研究問題與方向。

2004年，他受時任華中科技大學新聞與資訊傳播學院院長吳廷俊教授之

---

15 該課題為日本龍谷大學國際社會文化研究所2002-2004年度共同研究課題。參加這項課題研究的有：當時任職於該校國際文化學院的卓南生教授、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程曼麗教授和北京大學陳昌鳳副教授及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碩士研究生劉揚、楊瑾和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研究生劉波、殷新宇。該課題第一部分的初步研究成果三篇論文日本版於2004年刊於龍谷大學《國際社會文化研究所紀要》第6號，中文版刊於2004年程曼麗主編《北大新聞與傳播評論（第一輯）》。



託，承擔副指導教授任務，接受吳教授名下博士研究生馬嘉到龍谷大學進修數月。在卓南生的引導下，馬嘉以同志社大學為個案研究，著重探討日本新聞傳播教育的體制。藉此機會，卓南生在龍谷大學深草校區附近的喫茶店，以每週一次頻率，面向京都地區講華語的師生開設討論課。在課上，碩士生、博士生輪流分享研究的階段進展，或共讀一本書，又或圍繞熱門新聞話題展開探討。這使他對中國留學生的問題意識與寫作能力有了更深認識（陽美燕，2015）。

2005 年，卓南生受聘華中科技大學新聞與資訊傳播學院博士生導師，湖南大學教師陽美燕成為他的博士研究生。卓南生耐心引導並非專攻新聞史的陽美燕，鼓勵她從湖南湖北兩地新聞史入手進行個案研究。陽美燕通過閱讀大量材料，選擇研究晚清日本人從英國人手中購買《字林漢報》後而出版的《漢報》，探討日本在華設立的首份政論報紙如何誘導輿論、服務日本「國益」，最終形成她的博士論文和專著。中南民族大學教師汪前軍也在華中科技大學接受卓南生指導，完成了少人問津的《大公報》廣告史的博士論文，獲博士學位。

同時，卓南生在龍谷大學先後招收呂艷宏和孫曉萌兩位碩士研究生。呂艷宏專注於對「滿映」與李香蘭的研究。當中國大陸部分學者關注「滿映」如何影響了中國現代電影工業、李香蘭如何促進中日關係時，呂艷宏則深層探討「滿映」與李香蘭在日本對華文化侵略中所扮演的角色。孫曉萌關注日據時期淪陷區的中文報紙，結合自己來自中國天津的經歷，選擇日據時期在天津乃至華北都有影響力的《庸報》作為研究對象，系統梳理了誕生於北洋軍閥統治末期的報紙產生與發展歷程，最終如何一步步成為受日本侵略者控制。

卓南生對學生的指導看似寬鬆，但是從他給這些青年學人專著寫的序言中可以看出，他對自己指導學生有著嚴格的判斷標準，他們必須對自己所研究的課題充滿興趣，能夠主動克服研究中所遇到的困難並完全沉浸在研究的快樂之中。只是具備這些素質的學生都可遇而不可求，一些深受卓南生影響而醉心於新聞史研究領域的年輕學者與他結緣也多處於偶然。廈門大學的年輕教師毛章清在卓南生首次為廈門大學新聞學系作報告時與其相識，並在其指導下選取了日本人在中國華南出版的第一張中文報紙《閩報》作為自己的研究對象，勾勒出該報發展概貌，反映了日本在華報紙的發展與演變。2005 年，卓南生再次利用學術年假到北大講學，同時編纂《卓南生日本時論文

集》；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程曼麗教授指派本科生李傑瓊予以協助，而她也與卓南生互動過程中，明確了繼續攻讀博士研究生的目標並選取管翼賢所辦《實報》作為研究對象，並一路取得碩士、博士。與大陸部分學者刻意迴避管翼賢叛逆而強調其「嗜」報如命不同，李傑瓊的研究則將《實報》的報格斷裂現象置於「半殖民主義語境」下進行考察，揭示了私營報紙的妥協性與報格上的內在矛盾（李傑瓊，2015）。

同樣的，作為副指導老師，卓南生也協助程曼麗教授指導李松蕾，探討《大公報》對日俄戰爭（1904-1905）的報導姿態，完成其碩士、博士學位。2010年，北京首都經貿大學文化與傳播學院年輕教師賀心穎前往北京大學開始為期一年的訪學交流，並參加了北大新聞學研究會舉辦的第二屆全國新聞史論師資特訓班，逐步對「第三勢力」<sup>16</sup>代表報人曹聚仁（1900-1972）產生興趣並將其作為博士論文選題。這份論文批判了「第三勢力」的搖擺，與中國大陸學界炒作的「民國熱」和歷史人物寫作「一刀切」潮流不很協調，但在卓南生及北大新聞學研究會同窗支持下，賀心穎順利完成博士論文並出版專著。

對中國大陸新聞史研究，卓南生始終充滿希冀，但也抱有深深擔憂。他與中國新聞學界建立聯繫之時，也是傳播學快速進入中國大陸之日。從二十世紀50年代作為批判對象的大眾傳播學到二十世紀80-90年代傳播學被系統引進，先是實證研究方法，後是主流傳播理論典範引入和採納，「新聞與傳播」學院系如雨後春筍般增長，「言必稱希臘」現象在研究文章中越發普遍，對「國際化」的追求日漸強烈，「新聞無學」的聲音則持續湧現，「跨界」、「出圈」成為中國大陸新聞學界的趨勢……卓南生在日本所目睹的一幕似乎又在另一個國度重演。在此過程中，新聞史研究乃至歷史研究受到的衝擊最為明顯。重實務輕歷史的現象大量存在，在課程設置上，新聞史課程學時被壓縮，新聞史課程在某些院校由必修課轉為選修課，大量講授新聞史論課程的老師也紛紛轉移到傳播或媒體經營等領域，合格的新聞史師資人才短缺。在新聞史觀上，歷史的客體化、相對論等觀點成為一種時髦，「歷史是任人裝扮的小姑娘」、「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等都被不加解釋和批判地引用，抽象演繹所產生的研究成果遠高於基於具體詳實的歷史分析成果。更驚人的是，作為對中國大陸主流革命典範歷史研究的反動，新聞史中一些歷

---

16 第三勢力主要是指二十世紀20至50年代，以眾多性質相近的政治黨派和社會團體為依託，以民族資產階級、上層小資產階級以及自由知識分子為主體的勢力（賀心穎，2020，頁8）。

史階段的關注被異常地增強或減弱，對一些歷史人物的評價發生 180 度的轉變，「冷戰」背景下產生的、充斥另一種意識形態觀點的《報刊的四種理論》（*Four Theories of the Press*）（Siebert et al., 1956 / 戴鑫譯，2008），從被批判性參考變為新聞史課堂上的必讀經典書目，「複線歷史」等理論的引入更是模糊了本來清楚的歷史主線。

對此，卓南生利用各種場合給青年學人講述他自己的治學經歷和感悟，在 2002 年和 2017 年，相隔 15 年，兩次以「新聞傳播史研究的『誘惑』與『陷阱』」為題與青年分享治史苦樂，對中國新聞史研究的偏差，也直言不諱，耐心地勸導青年研究者要提防「新媒體研究熱」中「跨學科對話」的「誘惑」與「陷阱」，避免重蹈東京大學新聞研究所閉所的覆轍。就某些觀點和事實，他不厭其煩地一講再講。當聽到有人抱怨說，卓南生怎麼總在重複講那些事，他只是置之一笑，回應說，講了那麼多次，但是在這個問題上還是有所誤解，說明還不夠。同時，他以身示範，通過對自己關於寧波《中外新報》研究的階段性分享展示一項研究是如何在鏗而不捨努力下不斷深化。在他的引領下，很多學子被吸引到新聞史研究領域並沉醉在史實發掘之中。

### 三、推動中國新聞史論研究人才隊伍建設

2004 年，卓南生逐步將自己的教學和研究轉向中國大陸。他開始以點帶面，將有志於新聞史研究的個人特別是青年人彙聚成為一個學術團體，形成中國新聞史論研究的一股力量。2006 年，時任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副院長程曼麗和卓南生在北京大學共同主持「北大新聞史論沙龍」，圍繞新聞史論進行分享或一起讀書交流，逐步匯聚了基本成員。

2008 年，卓南生積極支持程曼麗教授推動北京大學新聞學研究會的復會並協助開展其會務活動。這個曾在歷史上有過三年短暫活動的研究組織曾開創了中國新聞學教育和研究的多項第一。程曼麗和卓南生希望通過這個平臺延續中國新聞學的光榮傳統，讓新聞史學、史觀的研究行駛在正確軌道上。在對象上，卓南生選擇以培養聯絡青年教師為主；2009 年起，北京大學新聞學研究會連續五年在暑期舉辦「新聞史論師資特訓班」，吸引大量在新聞學領域從事教學與研究的青年參與，先後培訓的學員共計 100 人。學員來自高校、研究機構、媒體。除中國大陸外，還有來自日本、澳門的學員，體現了有教無類。在培訓班的基礎上，學員們成立了師資特訓班同窗會，成為長期

保持聯繫、共同進步的同儕學術群體。2010年起，先後在北京、廈門、長春、吉首、南京、長沙舉辦了九屆新聞史論青年論壇暨北京大學新聞學研究會年年會，成為同窗會會員與新聞史論研究者年度交流的重要活動，不僅推動了個人學術研究的持續深入，也密切了學術共同體內成員間的關係。

2010年春天，卓南生提前從龍谷大學退休，轉移至北京大學繼續從事教學與科研工作。在他與程曼麗教授共同宣導下，北京大學新聞學研究會和北京大學世界華文傳媒研究中心定期舉辦「北大新聞學茶座」與「北大華文傳媒讀書會」，為從事新聞史研究與教學者提供了學術交流平臺。

「北大新聞學茶座」的設計接近卓南生新聞學教育理想，既要廣泛交流、自由討論，汲取百家之長，又要切入現實關鍵問題，在一個領域進行深入研究、不斷積累素材、深化思考。藉助「北大新聞學茶座」的平臺，除邀請中國大陸新聞學界與業界專家外，他通過個人關係或友人推薦，先後邀請著名時事評論員、鳳凰衛視總編輯阮次山（1946-2020），路透社前北京分社社長、時任中國首席記者林洸耀，臺灣世新大學口語傳播學系時任系主任夏春祥，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院長蘇鑰機，新加坡《聯合早報》總編輯林任君，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梁麗娟，加拿大西門菲沙大學教授趙月枝，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黃金輝傳播與資訊學院教授郝曉鳴，日本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學術院教授土屋禮子，臺灣政治大學傳播學院名譽教授朱立，美國明州默士達學院（Macalester College）教授譚汝謙，臺灣政治大學教授汪琪，香港大學榮譽教授薛鳳旋，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總編輯孫立川，前日本津田塾大學教授蔡史君等來茶座主講。講座者來源、觀點、角度多樣凸顯了茶座的開放性與多元性，拓展了茶座參與者的視野。

「北大華文傳媒讀書會」通過批判性的閱讀鞏固史觀、凝聚共識。圍繞部分研究者對民國歷史和近代化的追捧，卓南生推薦讀書會成員閱讀了曹聚仁的《中國近百年史話》（曹聚仁，2008）、《中國近代史》（蔣廷黻，2010）、《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胡繩，2001）、《從民族國家拯救歷史》（Duara, 1995 / 王憲明等人譯，2009）、《作為方法的中國》（溝口雄三，1989 / 孫軍悅譯，2011），在對比中認清不同的史觀如何看待近代化，如何認識侵略、歷史主線及中國的道路選擇。為了幫助大家瞭解冷戰歷史背景對社會科學特別是新聞傳播學的影響，卓南生組織大家先後閱讀了《脅迫之術：心理戰與美國傳播研究的興起（1945-1960）》（*Science of Coercio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 Psychological Warfare, 1945-1960*）（Simpson,

1994)、《冷戰與大學：通向戰後知識史》(*The Cold War & the University: Toward an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the Postwar Years*) (Chomsky et al., 1997) 和《臺灣傳播研究史：學院內的傳播學知識生產》(林麗雲, 2004)。部分讀書報告發表後，與單純「膜拜」類、摘抄類的讀後感形成了鮮明反差。

2014 年，卓南生同時擔任廈門大學新聞研究所所長，將教學、科研的重心逐步由北京移至廈門，北大新聞學研究會積累的成熟模式也隨之被帶到廈門大學。廈門大學新聞學茶座與北大新聞學茶座南北呼應，兩地讀書會在卓南生的指導下開枝散葉。2021 年，卓南生與夫人蔡史君教授被馬來西亞新紀元大學學院聘為榮譽教授兼博士生導師。他們出身南洋大學，而新紀元大學學院有「小南大」之稱。他們決定設立「南賢研究基金」，以支持該校研究生進行田野研究、參加學術會議及成果發表。幼年受教於南洋，而在暮年再回饋、支持南洋的華文教育，卓南生的教育理念也因此不斷持續著。



## 參考文獻

- 土屋禮子 (2011)。〈東亞研究的前沿—媒介史研究的現狀與展望〉，和田春樹、後藤乾一、山室信一、趙景達、中野聰、川島真 (編)，《岩波講座 東亞近現代史別卷 亞洲研究的來歷與展望》，頁 291-312。岩波書店。
- 方漢奇 (2002 年 12 月 12 日)。〈引起轟動的新聞史新著〉，《光明日報》，第 8 版。
- \_\_\_\_\_ (2018)。《方漢奇文集》(增訂版)。清華大學出版社。
- 毛章清、曹立新、呂豔宏 (2021)。《廈大新聞學茶座》。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王憲明、高繼美、李海燕、李點譯 (2009)。《從民族國家拯救歷史》。江蘇人民出版社。(原書 Duara, P. [1995]. *Rescuing history from the nation: Questioning narratives of modern China*.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足立利雄 (1991)。〈卓南生著《中國近代新聞成立史 (1815-1874) 》〉，《東亞月刊》，5：121-122。
- 吳學文、卓南生 (2005)。《中日關係出了什麼問題》。北京大學出版社。
- 李傑瓊 (2015)。《半殖民主義語境中的「斷裂」報格：北方小型報先驅《實報》與報人管翼賢》。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李琨譯 (2003)。《文化與帝國主義》。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原書 Said, E. W. [1993]. *Culture and imperialism*. Chatto & Windus.)
- 林麗雲 (2004)。《臺灣傳播研究史：學院內的傳播學知識生產》。巨流圖書公司。
- 卓南生 (2002)。《中國近代報業發展史 (1815-1874) 》(增訂版)。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_\_\_\_\_ (2006a)。《卓南生日本時論文集 (日本社會卷) 》。世界知識出版社。
- \_\_\_\_\_ (2006b)。《卓南生日本時論文集 (日本政治卷) 》。世界知識出版社。
- \_\_\_\_\_ (2006c)。《卓南生日本時論文集 (日本外交卷) 》。世界知識出版社。
- \_\_\_\_\_ (2008)。《日本的亞洲報導與亞洲外交》。世界知識出版社。
- \_\_\_\_\_ (2013)。《日本的亂象與真相：從安倍到安倍》。世界知識出版社。
- \_\_\_\_\_ (2015)。《中國近代報業發展史 (1815-1874) 》(增訂新版)。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_\_\_\_\_ (2019)。〈素描與考卷〉，華中董事部、華中校友會 (編)，《百年華

- 中情：1919-2019》，頁 376-379。新加坡：華中董事部、華中校友會（非賣品）。
- \_\_\_\_\_（2020）。《東亞新聞事業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_\_\_\_\_（2021）。〈動盪年代裡的華中山崗歲月（1956-1961）〉，《甲子回顧》，頁 94-99。新加坡華僑中學 1961 年畢業班同學離校六十周年紀念特輯（非賣品）。
- 胡 繩（2001）。《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人民出版社。
- 孫軍悅譯（2011）。《作為方法的中國》。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原書溝口雄三 [1989]。《方法としての中國》。東京大學出版會。）
- 曹聚仁（2008）。《中國近百年史話》。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 陳禹蒙（2014）。〈歷經身份認同的掙扎，以身為華校生為豪——訪問光洋學校校友卓南生〉，潘星華（編），《消失的華校生：國家永遠的資產》，頁 86-87。新加坡：華校校友會聯合會。
- 陳 娜（2014）。〈研究的起點是找準自我定位——訪新加坡旅華學者、北京大學客座教授、日本龍谷大學名譽教授卓南生〉，《新聞愛好者》，435：56-60。
- 黃仲鳴（2010 年 3 月 13 日）。〈卓南生精神〉，《文匯報》，「琴台客聚」欄目。
- 彭家發（1999）。〈一字一汗滴，十年心血盡成書：談卓著《中國近代報業發展史》成書歷程及其他〉，《新聞學研究》，58：289-290。
- 賀心穎（2020）。《報人曹聚仁的報刊活動與思想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陽美燕（2015）。《日本在華首家政論報紙《漢報》（1896-1900）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蔣亞平（1993）。〈「亞洲的心聲」——記新加坡報人、學者卓南生〉，《新聞戰線》，3：54-56。
- 蔣廷黻（2010）。《中國近代史》。嶽麓書社。
- 戴鑫譯（2008）。《報刊的四種理論》。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原書 Siebert, F. S., Peterson, T., & Schramm, W. [1956]. *Four theories of the press*. University of Illinois.）
- Chomsky, N., Lewontin, R. C., Katznelson, I., Nader, L., Ohmann, R., Montgomery, D., Wallerstein, I., Siever, R., & Zinn, H. (1997). *The cold war & the university: Toward an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the postwar years*. The New Press.

Simpson, C. (1994). *Science of coercio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 psychological warfare, 1945-1960*.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本文引用格式

陽美燕、李傑瓊、劉揚（2022）。〈新聞史論、時事評析與新聞教育：卓南生的傳播研究與實踐〉，《傳播研究與實踐》，12（2）：107-146。http://dx.doi.org/10.53106/222114112022071202005

Yang, M. Y., Li, J. Q., & Liu, Y. (2022). Historiography of journalism, current affairs commentation, and journalism education: Toh Lam Seng'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nd practic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nd Practice*, 12(2), 107-146. http://dx.doi.org/10.53106/222114112022071202005 [Text in Chinese]

## 附錄：卓南生簡歷

簡歷	大事表
1942 年 4 月 生於新加坡	1942 年 2 月 新加坡淪陷為「昭南島」，日本佔領新加坡三年八個月（1942-1945）。 1945 年 舊殖民統治者英國返回新馬，東南亞掀起反殖、爭取獨立運動熱潮。
1950-1955 年 新加坡光洋小學	1955 年 29 個亞非國家和地區政府代表團在印尼的萬隆舉行萬隆會議。
1956-1961 年 新加坡南洋華僑中學	1956 年 陳六使倡議、萬眾一心創辦的南洋大學正式開學。 1957 年 馬來亞聯邦成立。 1959 年 新加坡自治邦成立。
1962-1964 年 新加坡南洋大學文學院攻讀政治學	1963 年 馬來西亞成立。 1964 年 東京舉辦奧運會。 1965 年 新加坡退出馬來西亞獨立。
1966-1969 年 日本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學部新聞學科（獲經濟學士）。自 1967 年起為新加坡《星洲日報》和《南洋商報》撰寫日本通訊稿。	1968 年 日本隆重紀念明治維新一百年，全國史學界對明治百年功過展開大論戰。 1969 年 1 月 警備部隊沖入日本學運據點的東京大學安田講堂，驅散抵抗的學生，史稱「安田講堂攻防戰」。
1970-1972 年 日本立教大學社會學研究生院，獲社會學碩士（主修新聞學），探索新聞發生史研究。	1970 年 大阪舉行萬國博覽會。日美安保條約自動延長。右翼作家三島由紀夫切腹自殺。
1972-1986 年 同校社會學研究生院獲該校首名社會學博士學位（1986 年），主修新聞學。期間曾在《朝日新聞》研習，系該報戰後首名外國人研修生。 1973-1983 年 任新加坡《星洲日報》社論委員兼研究部主任或執行編輯。其間曾停薪留職，到英國大英圖書館等收集報史原始資料，並在 Sussex University 修讀國際關係學。	1972 年 9 月 日相田中角榮訪問北京，中（中華人民共和國）日關係正常化。 1974 年 1 月 田中角榮訪問東南亞，引發雅加達「反日暴動」。 1977 年 8 月 福田赳夫首相在馬尼拉發表不做軍事大國等的「福田主義三原則」。 1978 年 8 月 中、日在北京簽署和平友好條約。 1982 年 日本篡改教科書事件。
1983-1987 年 任《南洋商報》和《星洲日報》合併後《南洋·星洲聯合早報》的社論委員。	1985 年 8 月 15 日 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率全體閣僚正式參拜靖國神社。
1987-1989 年 作為《聯合早報》海外特派員試點，被派往東京任特派員，從事東北亞政治、經濟、外交、社會的報導和分析。此後，先後或同時在馬來西亞《星洲日報》《南洋商報》、香港《信報》、臺灣《中國時報》《中時晚報》《聯合報》《日本文摘》和日本《東京新聞》《每日新聞》《東洋經濟週刊》《信濃每日新聞》等開關時事專欄並出版若干中、日文時論文集。	1988 年 12 月 韓國舉行 16 年來首次直接民選總統選舉，「三金一盧」展開激烈爭奪戰。 1989 年 1 月 日本裕仁天皇逝世。

簡歷	大事表
<p>1989-1992 年 任東京大學新聞研究所副教授，為該所首名外籍專職教學人員。1990 年，出版《中國近代新聞成立史 1815-1874》日文版著作。</p>	<p>1989 年 11 月 柏林牆倒塌，象徵東西冷戰告一個段落。</p>
<p>1992-1993 年 名古屋大學國際開發研究生院客座研究員。期間撰寫大量時評，剖析日本新政黨林立、日本政壇大洗牌的「表」與「裡」，並擔任《東京新聞》「媒體評論」欄每月一評、為期兩年的評閱人，部分作品收錄於《大國夢與盟主論——總保守化的日本政治與外交》（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5 年）和日文版《日本的亞洲報導與亞洲論》（東京：東洋新報社，2003）。</p> <p>1994-1996 年 作為「新學部國際文化學部籌備委員」，轉任為京都龍谷大學教授。</p>	<p>1993-1995 年 日本政壇大洗牌，由「保（守）革（新）對峙」的「1955 年體制」轉為「保保體制」的「總保守化」時代。</p>
<p>1996-2010 年 龍谷大學國際文化學部、國際文化研究生院教授。長期負責主編《國際文化研究》。其間同時在東京法政大學、廣島大學等研究生院兼課。也利用學術年假在北京大學等高校講學，並任中國新聞史學會名譽顧問和北京大學新聞學研究會副會長兼導師。中文版《中國近代報業發展史 1815-1874》先後在臺北（1998 年）、北京（2002 年增訂版）出版。2006 年，《卓南生日本時論文集》（《日本政治》《日本外交》《日本社會》）面世。另，中文版《日本的亞洲報導與亞洲外交》則先後在北京（2008）、臺北（2009）出版。</p>	<p>1997 年 7 月 香港回歸中國。 1998 年 5 月 北京大學舉行百年校慶。 2008 年 4 月 北京大學新聞學研究會（1918-1920 年）復會。 2008 年 8 月，北京舉辦奧運會。</p>
<p>2010 年 - 現在 提前退休，轉任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客座教授。以北京大學新聞學研究會和北京大學世界華文傳媒研究中心為平臺，開展各種學術交流活動。其間先後或同時在華中科技大學任博士生導師、廈門大學新聞研究所所長、汕頭大學、馬來西亞新紀元大學等高校任客座教授、講座教授或榮譽教授。先後出版《日本的亂象與真相——從安倍到安倍》（世界知識出版社，2013 年版）、《中國近代報業發展史 1815-1874》（2015 年增訂新版）和《東亞新聞事業論》（2020 年版）等專著。（與程曼麗教授）共同主編「北京大學新聞學研究會學術文庫」，現已出版近 20 種。</p>	<p>2010 年 5 月 上海舉辦世博會。 2019 年 新加坡南洋華僑中學百年校慶。 2021 年 廈門大學百年校慶。</p>



# Historiography of Journalism, Current Affairs Commentation, and Journalism Education: Toh Lam Seng'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nd Practice

YANG, Mei-Yan<sup>\*</sup>

Professor,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s, Hunan University

LI, Jie-Qiong<sup>\*\*</sup>

Associate Professor, School of Media and Design, Beijing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University

LIU, Yang<sup>\*\*\*</sup>

Deputy Secretary-General, Institute of Journalism, Peking University

## Abstract

Toh Lam Seng is a renowned scholar for his research on the history of journalism and a famous international affairs columnist. He worked as an editorial board member of Singapore's *Sin Chew Jit Poh* and Lianhe Zaobao's Tokyo correspondent. Starting from the late 1980s, when he began teaching at the Institute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Studies of the University of Tokyo late 1980s, Dr. Toh has been devoting himself in journalism education in China and Japan for more than 30 years. Currently, he still participates in the Institute of Journalism, Peking University and uses it as a platform to engage young scholars and students in dialogues. His representative works include *The Beginnings of Modern Chinese Newspapers and their Development in the 19th Century (1815-1874)* published in 1990, 1998, 2002, 2015, and *East Asian Journalism* published in 2010 and 2020. This study starts from Toh's childhood experience, in which he witnessed the politics of Southeast Asia.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social changes of Japan and other Asian societies, this study outlines Toh's thoughts and views on historiography, column writing on international affairs, and journalism education. With his work on the history of the development of newspaper industry in China, his long years of personal experience of Japanese society and Chinese newspaper industry, and his career in international affairs column writing and Journalism education, he developed a clear and stable Asian perspective and an emphasis on

historical evidence and critical analysis of history.

**Keywords:** Japanology, Asian perspective, problem awareness, history of the development of newspaper industry

---

\* E-mail: 1291627558@qq.com

\*\* E-mail: sunnydaisylee@163.com

\*\*\* E-mail: 1014182423@qq.com

